

怀念唐耕耦先生

回忆与唐耕耦先生共事的点点滴滴

黄正建

唐耕耦先生于 2017 年 11 月去世。听到消息，心中十分难过。我与唐耕耦先生曾共事数年，于是回想起当年的点滴小事，写在这里，借以怀念他并寄托我的哀思。

说是共事，其实是在唐耕耦先生领导下工作。我 1981 年研究生毕业，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文献研究室，主要参加张政烺先生主持的《中国古代历史图谱》工作。当时在古文献室底下还有个非实体的“敦煌小组”，成员 7 人左右（唐耕耦、那向芹、卢善焕、黄振华、耿昇、师勤、我），分属不同研究室，组长虽未正式任命，但实际由唐耕耦先生负责。我也是敦煌小组成员。随着古文献室的撤销，后来敦煌小组又挂靠在了魏晋隋唐史研究室。

当时敦煌小组的工作除了介绍国内外敦煌学成就外，主要是做资料建设。唐先生那时已经在着手进行后来享誉敦煌学界的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的编写。为编写方便，也为能给新成立的“敦煌小组”打下资料基础，唐先生向院里申请到一笔经费，打算将全部敦煌文献胶卷（英藏、法藏、北图藏）放大，冲洗成规格一致的照片（大约小 32 开书大小），一张照片一个纸袋，按号排列，放在特制的抽屉里，供研究者使用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，查阅缩微胶卷还比较困难，这一工作如果完成，确实能给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。我分到敦煌小组承担的主要工作就是制作、冲洗这些照片，包括寻找照相馆、照片公司，洽谈价钱（负片、正片、放大、洗印），接货付款，整理上架，等等。

^① 工作单位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。

这些工作十分繁杂、耗人。唐先生也知道这些，有时就跟我一起去干些主要是体力活的事情。记得有一次和他一起到九爷府情报复制公司去取负片，然后去和平里交款，再回来提货，总共花了车费 19 元 3 角（当时开始实行核算制度，任何人使用院、所公车都要付钱）。由于折腾的较晚，唐先生本想请司机吃饭，一看花了这么多车钱，也就算了。

由于我那时还是个刚毕业的学生，什么都不懂，与学术界交往也很少，唐先生就经常鼓励我、帮助我。比如 1983 年时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学藏文，正学的起劲，已在《中国藏学》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吐蕃历史文书的文章，但同时又考上了社科院教育局主办的日语强化班。二者都要天天上课，只能放弃一个，很难取舍。这时唐先生建议我放弃藏语，主要学日语。他的建议对我最后下决心起了很大作用。又比如，当时唐史学会刚成立，入会条件比较严格，需要两位学者介绍，后来唐先生以及李斌城先生作了我的入会介绍人，使我顺利加入了唐史学会。再如，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，出版了学会通讯。在唐先生的指示下，我撰写了介绍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敦煌小组”的文章，刊登在《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》1984 年第 3 期上。这篇文章不仅让学术界了解了历史所敦煌小组的情况，也使我的名字为敦煌学界所知道。这些都是唐先生在我学术生涯起步时对我的帮助。

唐先生后来心情不太好，也常常对我谈到一些涉及他的事情，说到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，令人无限同情。1986 年 3 月 4 日星期二，研究室上午召开了唐先生的欢送会，下午我帮他收拾东西、搬东西，最后送他走出了社科院的大门。那时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这以后我们还常见面，不仅在学术会议上，也到他家拜访过，但聊天的时间都很短，印象也不深刻。一直到 2011 年 4 月我们主办“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”，唐先生身体不好，但还是来了。这次我们谈了很多，他仍在关心也不断回忆历史所的情况，送给我一本他耗费极大精力撰写的回忆材料。他对工作了 20 多年的历史所，还是很有感情的。

当听说我手头的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》缺少第 5 辑时，立即答应送我一本。果然到 7 月份就收到了他寄给我的这本书。现在这套 5 本的硬皮精装大著就整齐插放在我的书架上，每次看到它，我都会想起与唐先生共事的点点滴滴，心中充满感伤。

唐耕耦先生，我会一直怀念您的。